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学科春秋 / 年度述评 / 2005年 /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6-11-28 李全德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点击: 951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李全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等等。

以下仅就本年度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论文略作综述,绝大多数过于专业的文学、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的论著从略。限于篇幅、学识与信息的不足,难免遗漏,请方家指正。

一、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说”自提出以来,经历了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和修正,其内涵较之最初已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范式,它已经成为学界对话的平台,一直在推动着学界对于唐宋史以及宋元明历史变革的探讨。本年度研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应该是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研究合作与对话。先是年初《文史哲》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杂志第1期组织的有唐、宋史学者参加的“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后来是年底出版的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

“笔谈”包括文章四篇。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对宋朝的“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并不存在从兼并到“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变化。林文勋《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强调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促成唐宋变革的作用。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论述了制度变迁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谢元鲁《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提出唐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而政治制度则相反，唐宋之际的统治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平等趋势，终于向宋元以后的君主集权高效率专制体制转化。

《唐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共收有24篇学术论文和7篇相关书评。其中张广达先生的6万字长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站在很高的学术立场上，以其国际性的视野，对于“唐宋变革说”的来龙去脉和内藤假说对中国历史各方面研究的影响从学理上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精到的分析，是清理百年来唐宋变革说学术史的总结之作。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则对美国宋史学界基于对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的修正而提出的、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唐宋转型说(郝-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专题论文中有8篇是唐宋并举的通贯性研究。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以《政要》、《宝训》类著述为切入点，比较了唐宋时期阐发“祖宗故事”的方式，讨论了唐宋君臣逐渐将保守“祖宗基业”推向自觉的过程。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讨论了中古国家礼仪新秩序的构建。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讨论了从唐到宋“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以及新神明体系的逐步形成。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从唐宋传奇与话本所反映的地理空间变迁入手，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的关键性变革。孟宪实《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则通过敦煌数据，讨论了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结社。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探寻了崔府君信仰发展过程中两条线索，讨论了混合有地方神和地府神双重因素的崔府君地位抬升与下降的演变轨迹。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探讨了枢密院在唐、五代、北宋前期的职能演变及其长官人选从宦官到文吏、文臣的变化过程。刘新光《唐宋江南地域空间的分化与整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他以“唐宋”为题的文章尚有30多篇，涉及到唐宋经济、制度、宗教、风俗等多个方面。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第4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畲田的相关问题及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宋军风《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石油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唐宋商人通婚的变化。熊海英《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复旦学报》第6期）论述了从唐代经北宋到南宋，中秋节从无到有，从文人行为到大众化节日的过程。

二、政治史

政治事件。王曾瑜《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陷落过程和原因，批评了宋朝统治集团能力的不足和政策的失误。王晓薇《北宋嘉祐治平时期的政治改革》（《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讨论了北宋中期的各种改革主张，认为其中只有王安石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真宗东封西祀的活动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符海朝《南宋楚州知州与山东忠义关系之辨析》（《殷都学刊》第3期）探讨了六任楚州知州在山东忠义问题上采取的种种措施，分析了南宋在山东忠义关系上失控的根本原因。

政治文化。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第7期）通过对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等有关文治的话语分析，揭示出话语阐释同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指出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

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第5期)指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的演变对促成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一消解过程的解读,使我们看到唐宋变革的很多侧面。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则着眼于宋代的政治秩序理念,通过五代史观的流变,观察史学观念、正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动态衍化。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文史哲》第4期)略述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天象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以及两宋对此天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显示星占解读与文化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第11期)认为宋高宗“爱元祐”背后实为“遵嘉祐”。这种所谓盛世楷模的束缚,使赵宋的后继者们屡失变革的机会。朱丹琼、范立舟《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南宋在追求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所显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及其对宋孝宗“内修政理”和韩侂胄“恢复故疆”的制约。

制度。张邦炜、杜桂英《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宋初期的都部署主要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宋初的统兵体制应概括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体制”。林煌达《宋代州衙录事参军》(《唐研究》第11卷)从编制、来源、职责、俸禄、转任、奖惩等方面探讨了州衙录事参军。范学辉《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史学集刊》第2期)讨论了北宋时期制衡三衙的种种措施;《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第3期)逐朝分析了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变化,指出北宋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范立舟、蒋启俊《两宋赦免制度新探》(《暨南学报》第1期)认为两宋时赦宥发展为常制,它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危害。刘斌《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六部架阁官制度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它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乱政,又培养了大量人才。游彪《宋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论述了邸报内容的诸多“禁区”以及邸报同官员之间的密切联系。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第4期)借鉴行政学中的“分离制”与“完整制”的概念解释了宋代地方行政组织体制的变迁及其政治意义;《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分析了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的财政职能及其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参与,认为由于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而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

法制。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11卷)概括了宋代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追踪了在南方与北方、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差异与互动中,保障中产之家利益的法律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魏天安《宋代的户绝继承法》(《中州学刊》第3期)认为宋代户绝继承法相当周密,体现了财产私权不断扩大和宗法关系逐渐淡化的趋势。杨芹《宋代流刑考》(《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以沙门岛为主要例证考察了宋代流刑的流放地、流人押送与管理等具体情况。赵旭《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了在国法和家法双重压力的民间诉讼的发展所受到的重重限制。

军事。程龙《论北宋对夏作战中的引兵就粮》(《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宋就粮兵原驻地与就粮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分析了就粮措施的实施与战争形势之间的相互影响。何锋《12世纪南宋沿海地区舰船数量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从北宋末年到12世纪60年代政府拥有的舰船数量的变化,指出孝宗在海军建设方面存在失误。

民族与周边。李锡厚《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州学刊》第5期)从迁徙杂居、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三个方面论述了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吴晓萍《宋代国信所考论》(《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两宋时期外交事务管理部门国信所的设置及其作用。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中州学刊》第6期)认为“国信使俗称泛使”的传统解释不准确并分析了宋辽交聘过程中的双方策略。刘秋根、王慧杰《论宋朝遣辽使节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提出宋朝遣往辽国的使节具有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并分析了这一特征出现的原因。郑琪《浅议两宋时期中越之间的战事》(《河南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两宋时期中越之间战争的三种形式及其主要特征。

陈旭《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中国史研究》第1)从走私的地点、走私者、走

私的商品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认为走私的主要原因西夏经济不发达。刘复生《宋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宋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较为温和的开拓政策，并分析了其土地赋税政策和田土交易政策。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随着唐宋时期内地对西南与岭南地区地理考察与地情知识的增多，对该地区“荒蛮”印象和“蛮夷”文化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谢重光《温床与中枢：南宋与明中叶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分析了南宋时期的汀赣两州对孕育客家民系的温床作用。杨蕤《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分析了党项内附后对宋夏沿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三、经济史

总论。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已启动，未成正果的原因是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

财政。黄纯艳《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宋代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李晓《宋朝政府购买的拨款系统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内藏和朝廷封桩系统的出现是造成政府购买活动中拖欠货款甚至巧取豪夺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李晓、姜雪燕《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方式》（《史学月刊》1期）指出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表现出了实物调运的“轻赍”化，便钱汇兑和异地结算的信用化，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的本地化等趋势性特点。

农业。曾雄生《析宋代“稻麦二熟”说》（《历史研究》第1期）用翔实的资料重新检讨了宋代的“稻麦二熟”说，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历史原因，稻麦复种在宋代的发展有限，并不普遍。稻麦二熟，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稻麦在同一块田地中轮作复种的结果，而是因地制宜，异地而植，宜稻则稻，宜麦则麦的产物。

田制。杨际平《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重申宋史研究学者对土地集中程度的估计太高，认为北宋时期土地分散的作用力大于土地集中的作用力。陈明光《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文史哲》第1期）从唐宋比较的角度，阐述宋代逃田产权制度的特点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演变、弊端和原因。魏天安《宋代官田鬻卖规模考实》（《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被鬻卖的主要是原为民田的没官田，且规模不大，而学田、职田、屯营田以及沙田等官水利田仍在扩展，其规模远大于所卖官田。

人口。程民生《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史学集刊》第1期）认为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是宋以来北方社会经济落后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吴锡标《南宋浙西地区市镇类型及人口规模探析》（《社会科学》第4期）估算南宋中期前后浙西地区的市镇人口总量有近9万户，逐渐呈现出类似经济都市的特征。李华瑞《论宋代乡村客户的流动》（《唐研究》第11卷）勾勒了从五代至南宋乡村客户社会地位的变动曲线，分析了其群体结构性流动的规模和程度。

赋役。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第1期）、《分工与合作：两宋乡役职责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两文考察了两宋乡役人数的变化和主要职责，探讨了两宋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

区域经济。李清凌《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论述了宋代西北的民间与官方的农业开发和以茶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开发，指出这种开发与前代一样，都是以军需供应为目标的军事动力型开发。王赛时《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的生产与开发》（《盐业史研究》第4期）从产业规模、从业人员、盐场制度、制盐技术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发展。罗雄飞《宋代汀、赣诸州私盐问题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汀、赣诸州的私盐贩集“贩”、“盗”于一身，其走私具有大众化、武装化、长期化的特点，是食盐专卖政策和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的产物。杨果、陈曦《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江汉考古》第3期）依据考古资料，考察了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与特点。沈慧《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论述了两宋时期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的种种表现。李瑾明《南宋时期福建

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讨论了各自区域内的米谷供求问题。吴锡标、陈国灿《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江海学刊》第4期)认为江南城市已由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转变为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商品经济中心。陈国灿、陈剑峰《南宋两浙地区农村家庭经济探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南宋两浙地区的农村家庭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农副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专业户,家庭副业普遍向“兼业”形态转变,反映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朝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工商业。游彪《宋代商业民俗论纲——以城市餐饮业为中心的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宋代城市餐饮业的经营方式和习俗。王菱菱《从铁钱铁兵器胆铜的生产看宋政府对铁需求的增长》(《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由于受到国家货币、军备政策和胆铜法生产的影响,宋代在铁钱等三个方面的用铁量大增,从而推动宋代铁矿业发展。

四、社会史

家族。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以宋代为中心的观察》(《唐研究》第11卷)以宋代为中心,观察科举社会新竞争环境下家族发展的途径及其转变,讨论家族兴衰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基层社会。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第4期)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指出士人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刁培俊《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河北学刊》第2期)则论述了乡村富民在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梁建国《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南都学坛》第3期)提出熙宁变法之后作为地方自治及保卫组织的都保,依人户而划分,实施行政上的管理,日渐具备乡村区划的功能,它同原来的定方位、籍贯的乡并存。

礼俗宗教。刘黎明《宋代民间“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杀人祭鬼与密宗信仰的关系,说明“人祭”这种古老的野蛮信仰在宋代确实再度兴起。方燕《巫术与人生礼俗——以宋代为例》(《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尽管巫术掺杂了许多有悖礼制、荒谬和非理性的成分,却作为习俗融进了日常生活。皮庆生《宋人的正祀、淫祀观》(《东岳论丛》第4期)指出在正、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杨建宏《略论宋代淫祀政策》(《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宋代基层社会淫祀流行,具有对地方进行控制的黑社会性质,宋代政府对之一般采取打击与合法化两手策略。俞黎媛《张圣君信仰与两宋福建民间造神运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宋代福建张圣君信仰及其传说中的文人化色彩及其亦巫亦道亦佛的原初信仰特征。游彪《“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提出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与民间丧葬之“俗”共生共存,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社会意义》(《唐研究》第11卷)根据考古材料,比较了唐宋时期的丧葬制度与习俗,指出了诸多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密切关联。

林悟殊《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批评了有关摩尼教入华路线说法中的非学术倾向,论证宋元时期福建滨海地域流行的明教是由陆上传人的唐代摩尼教华化变异而来,并非海路输入。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第3期)指出8世纪后期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不禁饮酒,从酒戒松弛这一个特定角度着眼,揭示敦煌佛教的世俗化性质。

社会管理与控制。李瑾明《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运作和国家权力——以居养院制的变迁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3期)考察宋代贫民收养设施的具体情况,认为大部分居养院的财政基础脆弱,无法提供长期维持所需要的财源,其盛衰与社会情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张文《社区慈善:两宋民间慈善活动的空间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指出两宋民间慈善活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主要面向“熟人”的乡村社区慈善与主要面向“陌生人”的城市社区慈善。前者有开放性特征,后者具有封闭性特征。杨世利《宋朝以工代赈述论》(《中州学刊》第3期)论述了工赈的组织、工赈救济的对象以及工赈所兴之役和经费主要来源。石涛《北宋地方灾害评估系统》(《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从灾害学的角度,论述北宋时地方灾害评估体系,勾勒出这一体系的运作流程并探讨其效果。杨建宏

《论宋代家训家范与民间社会控制》(《船山学刊》第1期)论述了家训家范如何突破家族的范围与国家的“王法”相表里加强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文人治生。徐永斌《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认为成名文人治生的手段主要是卖文或撰写碑铭,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下层文人则治生手段更加多样。费君清《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文学遗产》第6期)指出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和经济来源主要有干谒权贵;亲友周济;出卖诗文字画;教书授徒,代人撰述等四种。

其他。李健秋《女祸观念影响下的市民叙事——论宋元话本中的烟粉灵怪故事》(《学术交流》第7期)认为在宋元话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的以妖魔鬼魅为主要内容的烟粉灵怪故事,实际上是流传于市井的寓言,是笼罩在女祸观念下的功利性的市井叙事。李瑞《北宋东京公共娱乐空间形态分析》(《南都学坛》第6期)分析了东京公共娱乐空间要素的表现特点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东京公共娱乐空间与都城空间形态的三种表现关系。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征引了大量文集、笔记中的资料,介绍和论述了辽宋西夏金时期的避讳、称谓和排行的情况和特点。

五、文化史

文化。孔学《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述论》(《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叙述了宋朝书籍和文章之禁的范围和书籍审查制度的建立,指出禁令和禁书的标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邓建鹏《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环球法律评论》第1期)认为宋代产生了比较完整的版权意识与观念,但宋代的版权形态仅仅表现为某些营利出版商的版权利益主张与个别地方官府偶尔、零散的行政庇护相结合,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催生出版权法或知识产权制度。魏华仙《宋代纸消费特点初探》(《文史杂志》第2期)认为宋代纸的消费有重轻巧、长幅和废旧纸的利用三个特点。

思想。徐规、杨天保《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提出“王学”有原生形态的“金陵之学”、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范立舟《论两宋理学家的政治理想》(《政治学研究》第1期)认为两宋理学家的政治理想最能体现儒家主流政治哲学的特质,它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其目标的完美性阻碍了理学家对实际问题的认知与处理。

科举与教育。[日]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将科举区域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维持不变型和递增型三种类型,指出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是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即“庆元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王德毅《宋代的科举与士风》(《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对士风的不利影响。祝尚书《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论述了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的程式化过程以及程式化的弊端和影响;《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分四个时期勾勒了理学在南宋初开始介入科举考试的过程及其对时文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周扬波《宋代科举会社》(《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主要分析了科举经济互助会社中的义约。龚延明、何平曼《宋代“殿试不黜落”考》(《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考察了宋代殿试中杂犯的黜落情况及其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影响。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考察宋代童子科的起始时间、年龄标准、合格童子日后发展情况和童子科在宋代社会的影响。张雪红《论宋代提举学事司的创制与其在教育传播中的督导功能》(《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提出崇宁二年在地方诸路创制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史上设立最早的专管州县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在宋代已萌芽。邓洪波《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船山学刊》第2期),认为南宋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趋势,促成了湖湘学派的出现,构建了湖湘学统,它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湖南大学学报》第6期有三篇讨论宋代书院的文章:贾志扬、潘海桃《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李兵、袁建辉《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田浩、黄梓根《宋代中国

的儒家书院》。

文献与史学。王曾瑜《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的《三言》、《二拍》在宋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及其局限。曹刚华《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论述了宋代佛教史籍对于唐五代佛教史和唐代世俗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陈光崇《南宋史家洪迈及其亲友轶事辑》(《史学研究》第2期)

文物与考古。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第3期)考证了北宋东京内城4厢46坊中21坊的相对位置,认为宋皇城南御街两侧中央衙署的规划,开启了明清时期北京“千步廊”两侧为中央六部的先河。同氏《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考》(《华夏考古》第3期)考证了汴河东水门的结构与布局,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即为东水门组成部分之一的上善门。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该经卷首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指出它上承唐写本星图,下启宣化辽墓星图,是中西两大星宫体系交流的重要物证。陈杰《从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看宋金时期的儿童活动——兼谈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的风格特点》(《四川文物》第5期)从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的典型题材入手,分析了儿童们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揭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尚。

六、研究回顾

本年度的综述类文章主要有:李华瑞《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增刊),曲鸣丽《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李华瑞《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董萍《近二十年来宋夏金时期西北经济史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付海妮《近十余年来宋代女性史研究探述》(《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真锅多嘉子《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王艳《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婚俗研究综述》(《民俗研究》第1期),熊燕军《20年来大陆宋代租佃制研究综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岸本美绪撰、栾成显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期),朱海《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7期)。

总的来说本年度的宋史研究,成绩还算可观。除了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外,专题史研究在新方法的运用和新议题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尤其表现在政治文化、区域经济和基层社会的人群、管理与控制以及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上。实际上有很多论题是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经济史、社会史的框架所难以涵盖的,他们往往是多视角、多种方法或者多种学科交叉综合影响下的产物。

从选题的时段和研究队伍上看还可以大致获得如下的印象:一是变革视野下的唐宋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真正能够做到贯通唐宋的研究并不太多,主要表现在对“唐宋之际”研究的不足上。从晚唐到北宋初,这个阶段有将近一个世纪,理应得到唐史学者和宋史学者双方的重视。本年度的研究中以唐宋为研究时段而真正能够将这个阶段纳入视野的文章不足10篇。二是在题目上,将整个两宋作为自己的研究时段的文章最多,其中以“两宋”、“宋朝”、“宋代”作为文章标题的文章超过300篇,而“北宋”100多篇,“南宋”80多篇,从数量上看,北宋史的研究与南宋史的研究几乎持平。实际上通论两宋的文章中,有开拓性的论题还是不多。相当数量的文章选题重复、或大而无当;内容拼凑,多泛泛而论,有叙述而无研究;观点陈旧,少精辟见解。再者很多研究其实仍只是以北宋或者南宋为主的研究。两宋之间的差异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不宜等同视之,以偏盖全。三是在研究队伍上,随着朝代研究框架的摆脱和学科交叉的影响,原先较为固定的断代史研究圈子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通常不被看作是宋史研究圈子的学者开始涉足宋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内容和角度对于学科间的融会沟通都非常有利。另一方面,在校学生构成了宋史研究领域中庞大的流动研究群体,每年都有相当一批论著出自这一群体,其中固然不乏很好的作者与选题,然而更多的还是平平之作。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